五四的信息

李利國

中國近代史上，不乏各種改革運動，如「百日維新」和「自强運動」，但由於「在封建專制的統治下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是文盲，一切的文化知識都被壟斷，根本談不上對於政治、經濟和社會作理論性的了解」（註一），總是虎頭蛇尾，沒有產生實質的效果。孫中山先生鑑於這些失敗和太平天國的錯誤，在奔走革命期間，就特別著重考察西方國家的思想，以圖融入中國文化歷史中，建設現代化的新中國。

一、思想的開發

可是，同時代的人心，由於封建遺毒尚未拔除乾淨，雖然推翻了滿清，却演成軍閥割據的局面。先有袁世凱稱帝的無恥，繼有張勳復辟的荒謬，之後是北洋政客鑽謀、求進，各地戰亂紛雜。　國父針對當時環境曾指出：「國內之軍閥既與帝國主義勾結，而資產階級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餘餘，故中國民族政治上經濟上皆日及於憔悴。」（註二）確然，那是個危急之秋，內憂已使中國民不聊生，外患又頻頻而至。

民國四年，日本提出「二十一條要求」，企圖控制中國的內政、外交、經濟和軍事，同時各國大量借款北洋政府而以關稅、鹽稅、土地礦業等爲抵押，嚴

重的影響了國家正常的生計。在此政治經濟雙重的侵略上，中國已經奄奄一息。有識之士則紛紛南下，追隨　國父繼續革命。國父提出民族主義，爲了是「不許外國人來治中國，要中國人來治中國，自己管理自己」（註三）有其時代背景，影響青年知識份子尤爲深切。

同時在北方，一位信仰中山先生思想的大學者——蔡元培，擔任了北京大學校長，時爲民國六年。他有感於國家的前途憂患，深知萬鈞責任都要當時的青年承擔，乃毅然執行思想的革新運動，他號召青年培養豪壯的志氣，建立虔敬的人生觀。

他認爲知識是接近眞理的客觀途徑；因此，他容納了各種思想，新舊熔於一爐，但他並不是要把學術孤立化，相反的，他强調求學爲了可以貢獻更多的自己給國家。在這種新學風的熏染下，年輕人的熱情得以舒展，年輕人的抱負得以開放，傅斯年、羅家倫的「新潮」雜誌是最好的證明。同時他們因爲關心中國文學文化的新內容，而對那個欲倒未倒的封建社會產生改革的雄心，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正是他們自我勉勵的口號。

二、從救亡圖存說起

青年思想的開發，正是五四運動形成的基礎。我們仔細檢視這段歷史的過程，就會發現這種無形的思想是推動社會前進不可忽視的力量。民國七年歐戰結束，全世界都興奮於「公理戰勝强權」的事實，中國的青年也認爲這正是中國復甦的開始。民國八年凡爾賽和會開幕，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十四點主張，强調民族自覺；中國青年開始爲中國的遠景編織理想。然而中國雖是對德宣戰的戰勝國，却受到戰敗國的待遇，青年爲之痛心疾首。

因爲日本與英法事先有秘密協定，所以和會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利益，全數轉讓給日本。美國雖反對，但由於北洋政客的勾結日本圖謀發展私利，早有秘密換文，膠濟鐵路換文於民國七年九月訂立，因此美國只有無奈妥協。經手這件事的是曹汝霖、陸宗輿、章宗祥等人。

巴黎和會傳來這種消息，當然使得知識青年大感失望。他們一方面懷抱復興民族的願望，一方面感慨

於民族利益的再度淪失，遂激起「內除國賊，外抗強權」的意識覺醒！五四運動的具體行動就在這種意識驅使下產生了。

這個運動，原來只是一個遊行活動，由北京各大學學生組成，要求駐華各國使館主持正義，並提出「外爭主權，內除國賊」的口號要求整肅親日政客。途經趙家樓，遊行的學生悲憤鬱悶，竟搗毀了親日份子曹汝霖的住宅，打傷駐日公使章宗祥，爲軍警逮捕三十二人，於是擴大了這個運動。

北大學生立卽成立「北大學生幹事會」，又成立「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」，得到全國學生的支持，他們一方面進行街頭演講，攻擊北京政府及親日派，一方面宣傳抵制日貨，造成人心激動之形勢。北京政府孤意遏止，於六月三日再度逮捕了講演同學七人，造成各校學生的公憤，大規模的講演展開，結果受軍警逮捕者近千名，導致北京市民的同情，率先罷市罷工，表示支持。消息傳開，震動了全國。各地工商界和知識份子一致響應，輿論界更如鼎沸一般！結果是當局釋放學生，明令將曹、陸、章三人免職，這個運動並强力阻止了中國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。這個愛國爭國格的運動，我們綜攝歷史，更會發現它的獨特意義。

三、兩個運動合流

五四運動的基本動力，是青年熱愛國家，是青年自覺於國家已處於危亡之秋，而做的一番救亡圖存的行動。這個行動在先前是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啓智，而後由於這個行動，使智識份子醒悟，愛國復國不是口號可以完成的，於是他們紛紛負笈異國，學習科學方法，邏輯組織，企圖重新整理自己古老的文化，汰陳揚精，以適應現代的中國。這種做法，激起了許多保守派人士的反對。

民國六年胡適先生由美國寄回一篇文章「文學改良芻議」，提出具體的八項主義，爲中國文學增加了新精神。陳獨秀繼而發表「文學革命論」，提出三大主張聲援胡適，爾後，得到錢玄同、劉半農等人支援，新文學運動如火如荼的漫延到全國各地。但許多老輩爲了自己的地位，仍然堅持反對新文學，例如林紓、胡先驌等人；但新文學運動提倡者得到當時北京大

學校長蔡元培的支持，似乎成爲時代必然的潮流了。

一般人把五四運動當成新文化運動是反因爲果。事實上是新文學運動促發了五四運動，五四運動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內涵。從此，一切文化整理、文化改革、文學創作都因爲「五四」的精神有了依歸。他們一切的努力，爲了把中國的積弱從根挽救起來，他們攻擊許多不合理的傳統，乃是爲了提倡理性主義，爲了提倡獨立思考，爲了使中國自強：

「那些青年看出中國之所以衰弱，中國之所以被欺侮、被侵略，中國人之所以抬不起頭來，還有更深刻更重大的根源。他們看出西方文明有它的長處和進步之處，中國文明有它的短處和不足之處。他們認爲西洋之所以强，基本上是由於科學發達和民主制度能使社會長期安定而繁榮，能使個人發展才能貢獻於國家社會。所以他們決心要把德模克拉西先生和賽因斯先生請到中國去。他們看到中國正統的思想體系受了儒家定於一尊的影響，大家庭制度、祖先崇拜和主權威力下所造成的倫理道德觀念，不能發展個性和天才。……。總之，他們看到中國被幾千年的閉關自守的傳統封閉了太久，結果一切都落後了。」（註四）

確然，新文化運動不惟不是要動搖國本，反而是一種建設「現在」國本的做法。因爲他們的大聲疾呼，我們才能重建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；因爲他們的改革批評才加重了我們建立新秩序新標準的決心；雖然他們也造成了流弊，像「全盤西化」論者對西方盲目的認知，忽略了我們社會結構和人文精神，使許多早該建構的思想本質，反而停滯不進。這段爭論的歷史，我們不須要再以陳腔濫調的語氣考察，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，「東方是精神文明，西方是物質文明」，皆是名詞上的弔詭，我們原不覺得有必要澄清，亦不覺得有裂痕衝突。我們須要的是「强化」傳統的潛能。

四、五四的信息

我們仔細研究那時代的思想內容，必然會同意，他們的反傳統是「批評層次」的表現，而企圖在傳統中墾殖新精神新內容，才是「革新層次」的基礎。所以，林毓生說：

「對於五四自由知識份子而言，獲得獨立之自由

的主要意義在於從傳統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束縛中求得解放。因爲，他們認爲傳統中國社會和文化所加諸個人的壓抑，實在太過嚴苛。因此，爭取個人獨立之自由，對五四自由份子而言，主要是指，從斷喪個人自由的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中解脫出來。然而，由傳統中國社會與文化壓抑下解放出來的自由，並不與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相同，西方個人自由的觀念導自個人價值在倫理上的基設，而五四時代，個人自由的觀念却是隨着反抗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，對個人的壓抑而增強的。易言之，五四時代早期，對個人愈形顯著的關懷是激烈反抗傳統思想興起的結果。」（註五）

五四時代，追求事理，追求眞理的熱忱，是無庸懷疑的，他們相信知識具有絕對的力量，可以衡準世界，可以做爲一切行爲的標準。他們當然也相信藝術和人文精神，對於社會有合諧充實的作用，但他們更相信科學方法和法治制度對於社會有整合推建的作用。這也就是他們一方面信仰實驗主義，一方面又强調浪漫的自由主義之故。

在他們那時候，沒有產生科學人文的紛爭，他們把科學當成客觀的事實，謹愼的態度，把人文當成民主的制度，尊重別人的修養，使中國思想界在那幾年中呈顯一股好奇、蓬勃而不執迷一端的風氣。

同時也喚起了無數心靈，改變了民國初年半封建的社會結構。寫到這裏，使我們想到他們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中，獻身於民族利益上，可以慷慨捨身，在一個文化轉型期中，爲了拓展傳統的價值，毅然與不合理的權威作戰；這個「實事求是」的精神，正是服務國家，處世立身的基礎，那個「外抗强權，內除國賊」的意識，正是青年覺醒的表現。我們今天的社會環境，雖然早已不同於那段時期，但我們所負的使命相同，就是 國父遺言「和平、統一、救中國」、紀念「五四」，我們特別要惕戒自己，努力負起作爲一個中國人應盡的責任。

註一：王曉波 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，夏潮第二卷第三期，六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。

註二：國父全集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。

註三：國父全集，農民大聯合。

註四：周策縱，五四運動告訴我們什麼，大學雜誌第十八期，六十年十一月出版。

註五：林毓生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傳統思想，中外文學第三卷十二期，六十四年五月出版。